



中国日耳曼学：管窥与偶得

魏育青◎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日耳曼学：管窥与偶得

魏育青◎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日耳曼学:管窥与偶得/魏育青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2
(攻玉文丛)

ISBN 978-7-309-11101-9

I. 中… II. 魏… III. ①德语-研究-文集②文学研究-德国-文集
IV. ①H33-53②I516.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8948 号

中国日耳曼学:管窥与偶得

魏育青 著

责任编辑/唐 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字数 410 千

201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101-9/H · 2409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一倏忽间,自己成了外文学院现职教工中最年长的一个。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孝泉院长嘱我为这个丛书写篇短序,我也不好推辞了。中国人请客吃饭让长者上坐时,会说(如果用英文)seniority is beautiful,其实让与被让者全明白,那不过是虚礼浮言而已。

虽与学院具体工作脱节已久,我仍感到,复旦的外文学院至今有很强的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我以为这是一个好传统。班级分得小,着重施基础训练于每个学生;管你什么大牌教授还是博导,都得给本科生上课,还自己动手改学生作业,对学生在学习中带共性的问题了然于胸;学外文必须讲究“精确”和“流利”并重的理念,始终扎根在我们的培养目标中。虽说这些年来物质第一主义的惊风骇浪也不免冲得有些同仁晕头转向,但基本的教学底线可以说还未被突破。我这儿就有个实例:外出做同传的教师并非单为丰酬,还主动把各种门类的知识、信息、技术、术语翻译等等的 firsthand 经验观感,带回送入课堂,或提供给编写教材或辞典的同仁做素材。怕就怕“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看人家把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丢了,反觉做“青螺”寒碜,赶着去跟风;当然,我还怕现状不改,甚至愈演愈烈,今后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与教学相比,研究工作可能不尽如人意。别说人家怎么看我们,就连本校领导可能也认定,以“研究型”标准衡量,外文学院在文科院系中算是比较落后的单位。前几年,我读过一本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所著《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的“奇书”(作者开宗明义的自我定位)。经作者梳理耶稣会教会大学、德国大学、“牛

剑”(Oxbridge)传统,算是懂了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与日耳曼各国的市场因素和官本位影响有关——对此也有人质疑甚至批评——有意思的是:在浩如烟海的近 580 页的考据和研究中,作者认为,现代大学里“眼睛战胜耳朵”或“文字重于口述”(恰与老子所谓的“行不言之教”字面上相悖?);要有“学术魅力”就得依靠发表论文/著作,并邀来别人的佳评。

这套丛书多少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复旦外文学院的相对薄弱环节,正在迎头赶上。只是我以为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应当以教学实践的积累为基础,又能回过头去促进教学,从而进一步造福社会。这并不排斥有的教师资质和志趣脱俗超逸,可能更适于从事纯粹的而非直接“用世”的研究工作,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的,“学人、科学家只代表与利益无涉的专业人格。”他们的论文是智力操练的成果,是他们“专业人格”的伸张,是乐趣的满足,发表后可望成为益智主义的佳品,用来抵拒目前正丑恶横行甚至威胁到学生的反智主义。

不过,“述”而有“作”(按朱熹解:“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即传旧同时要有所创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诸同仁能够各自搜辑文集,结成系列出版,肯定经过焚膏继晷的艰辛,自然要为此击节叫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现代研究型大学对教师造成极大压力。压力源就是基本上以量化为准绳的职称评议制度,一种更像是中世纪西方教会和骑士团社会遗形的制度。呜呼,西方曾有柏拉图式的平等对话,中土有“吾与回(指颜回)言终日”的孔子循循善诱,都已成了教育的“失乐园”,即使今人多喜引用,实际上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看来,我们都得接受 publish or perish 的学术生态铁则。可是,学术啊,多少投机取巧的卑劣,多少不择手段的钻营,多少蝇利蜗名的刊物,多少奸宄互利的委员会和辛迪加,借汝之名而行!

我常与同仁共勉:写论文,做学术,还是牢记“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古训为好,注重平时的勤奋积累,宁可日有寸进而不搞“大跃进”,疑他人所不疑,不以魁士定见为当然,给神话去魅,甚至质疑“常识”——总之,借用一个英语文评界的新词 problematizing——如此生存在学术圈里,可能被晒迂腐,不懂“性价比”,但就当事个人而论,是

不是学术会变得更生动活泼些？

虽说“文字重于口述”，研究型大学并不仅仅等于写出论文发表。提高一点要求说，还要培育师生的思辨口才。对教师的最低要求固然是要意尽于言，不能做大肚小口的“热水瓶”，各种课内外的研讨班（seminars）和口头陈述（oral presentations）也不能只是做做样子，多的是“单向交通”，各说各的；即使有认真听别人陈述的，大多也是谦冲自守，鲜见有人站出来质疑，更没有即时的交锋。想来，这与古希腊修辞重讨论（discourse）和演说（public address）以及古罗马的七艺（头上三种便是修辞、语法、逻辑）造成西方思辨口才传统有关，而中国修辞讲究的赋、比、兴和对仗、排比、平仄等等，非虑计再三，始能滞后表达。既然研究型大学是“舶来品”，真要培养与这样的大学匹配的人才，辩理遽生于电光火石的瞬间，辩才如舌粲莲花的训练，似也不可或缺。让我们先从提高 seminars 和 presentations 的质量做起，如何？

最后，也想对于不希望自己陷入昏庸的学界权力人物说几句：希望你们好好 problematize“成果”二字，细察目前一级又一级名号繁多的项目，戳破气泡，拧干水分，排斥上述威廉姆·克拉克描述中世纪大学特点时用的 nepotism（相当于今日所说的“关系”）。更想问一句，外文院系教师发表的译作（特别是其中有影响者，如当年杨必的《名利场》）以及长篇书评，何以不能算作成果？你们学过历史吗？当代中国学界的两次启蒙大转型，“五四”也好，改革开放也罢，大量的学术成果哪一次没有译作和书评的一席之地！惯以斤斤计较他人论文数量为业的专家，要不你们也来译一种，写一篇？

陆谷孙

2011年10月

目 录

撕开伤口,拒绝忘川 ——格拉斯《剥洋葱》中的“忆”	1
Muräne und Reuse. Eine daoistisch-sprachkritische Lesart des Chandosbriefs von Hugo von Hofmannsthal	14
《蜗牛日记》 ——在忧郁与乌托邦之间徘徊	35
Nähe und Ferne zur Natur: Mündlichkeit und Schriftlichkeit als „Wildbäume“ und „Topfpflanzen“	46
浮海的勇士,围炉的哀者: 1933—1945 年的德语流亡文学	63
Rosenhaus in Stifters „Nachsommer“: Ein Pfirsichblütenquell im deutschen Sprachraum?	87
卡珊德拉的尖叫和西西弗斯的努力 ——论格拉斯《母鼠》中的启蒙观	102
„Arkadien“ hinter und „Elysium“ vor uns? Schillers Weg zur Freiheit über die Schönheit mit historischem Rück- und Vorausblick — Eine Betrachtung mit zwei Jahrhunderten Abstand sowie aus chinesisch-konfuzianischer Sicht	118
“原卵”中的理念 ——席勒的叙事诗	133
提升了的镜像,美化了的现实 ——德语文学中的“诗意现实主义”	143

Graphozentrismus versus Phonozentrismus. Ein Aspekt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westlichen Diskurses	161
“大诗泉”的首次喷涌 ——试论里尔克的《祈祷书》.....	180
Heine und Rousseau	190
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 ——论格拉斯的《从德国到德国的旅途中: 1990 年日记》	208
Das Imaginäre und Kreative in der Erinnerungstrilogie von Günter Grass	217
耶利内克《白雪公主》中的解构游戏.....	232
„Fu zi zi dao“ oder eine „verschleierte Selbstdarstellung“: „Triumph und Tragik des Erasmus von Rotterdam“ von Stefan Zweig	240
德国文学的横向发展	251
德语中的“同词反义”现象.....	266
Walter Benjamin versus Qian Zhongshu: „Seelenwanderung“ oder „Fortleben“ des Werks durch literarische Übersetzung	280
交际理论中的信息四维说与中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区	297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als eine neue Ausrichtung im Spannungsfeld von „Brotgelehrten“ und „philosophischem Kopf“	316
教养、决断、建构 ——战后德国教学论的发展	332
Lehr- und Lerntradition für den DaF-(Fach)unterricht: Analoge	

und digitale Kommunikationsmodalitäten	339
中国德语专业教育史要	378
翻译是一种选择	414
勤奋的传奇,平实的辉煌 ——德语文学翻译家钱春绮	421
Rekonstruktion, Dekonstruktion oder Konstruktion: Die Identitätsproblematik der chinesischen Germanistik	434
部分参考文献	445

撕开伤口,拒绝忘川

——格拉斯《剥洋葱》中的“忆”*

德语文学作品中时常出现“忘川”:比如在席勒《赫克托耳的告别》中,一切憧憬和想念都将被沉入这条静静的冥河;在歌德笔下,阿莉儿要用“忘川之露”浇淋刚从悲剧第一部走出的浮士德,使之忘却过去的痛苦。中国传说也有忘川河,转世投胎者必经此河,过奈何桥饮孟婆汤,以涤除一生之忆。不过,在西方神话中还有一条“记川”和“忘川”对立,记忆和遗忘形成张力,而且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有两派意见双峰对峙。

“忘川派”认为人是“忘却生物”(animal obliviscens),不能忘记意味着苦难。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观察》第二篇中称忘却从某种意义上具有积极作用,几乎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量^①。《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开头的隐喻“骆驼、狮子、孩子”也一脉相承:“婴孩乃天真,遗忘,一种新兴……”^②此论并非空前绝后。之前有蒙田为“记忆力差”平反昭雪,认为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记忆之间水火不容。之后有弗洛伊德区分有益的忘却和有害的压抑,认为能够忘却才能避免心理障碍。迦德默尔也认为,唯有遗忘,精神方可获得革新、融合的可能性。

而“记川派”则从另一角度视遗忘为大敌,认为尤其面对上世纪

* 本书中各篇因选自不同刊物,为尊重原文起见,保留原脚注体例,故各篇体例略有不同,特此说明。

① 参见《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崑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页。在该书中,尼采还区分了三种对待以往的态度:一是惯于守常,巨细无遗地记录事实,以至于看不见未来;二是要大展宏图,敢于忽视细节,重构以往,替代所失;三是试图摆脱传统者,体现为“积极的忘却”,忘却过去,面向未来。

② 《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卷之一,第21页。

的人类之灾,更不能简单地“忘记过去,展望未来”。在纳粹魔爪下劫后余生的维瑟尔(E. Wiesel)在《夜》中发誓“这一切我永志不忘,哪怕我注定要活得和上帝一样长久”^①,一如犹太德语民谚:“想要忘却,流亡就会延长,若要得救,奥秘在于回忆”。在德国,要记住“诗人和哲学家”、却要忘掉“判官和刽子手”的人不在少数,但也有很多作家热衷于“记忆工作”,其中呼吁最勤、不厌其烦者当数当代德语文学的招牌——君特·格拉斯。

这个“共和国的纹章兽”不愿意喝下忘川水或者孟婆汤,不愿意苦乐悲欢一笔销,三生石前泯恩仇,因为在他看来,文学的本质是回忆。2006年格拉斯推出了《剥洋葱》,回忆了主人公20年的经历:战时的苦难和失足,战后“三种饥饿”的困扰,然后是浪迹天涯,追求艺术,家人团聚,朋友交往,“四七社”的童话,一直讲到1959年《铁皮鼓》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他再次追忆似水流年,从今天的角度以自传的形式,把从《铁皮鼓》到《蟹行》中的不少内容几乎复述了一遍。人物、场景、母题、观点都似曾相识,“我”生平的细节及其与创作的联系,不少也早为人所知^②。或许只有一点有轰动效应。书中透露了一件“可以断言,因而也就可以怀疑的”(125)^③的往事,虽然寥寥几页,却被不少媒体当作全部内容,至少是精华所在:“德意志导师”格拉斯曾是党卫军的一员,竟然带着“该隐额上的标记”——Waffen-SS^④。

“来自黑暗年代的八个字母和一个连字符,整个共和国便像开了

① 《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卷之一,第230页。

② 比如参见格拉斯《作者是靠不住的目击者》,德国袖珍本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引文页码均根据格拉斯《剥洋葱》,施泰德尔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格拉斯《我得接受该隐额上的标志》,载《法兰克福评论报》2006年11月10日。Waffen-SS指武装党卫军,为Die Waffen Schutzstaffel的简称,1940年在法西斯德国成立的嫡系军事组织,纳粹视之为政治上最为可靠的武装,参与了许多大屠杀罪行,为人痛恨。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犯罪组织。

锅。”^①不少人对格拉斯迄今道德法官的形象提出了质疑,谴责他为人虚伪或忏悔来迟,波兰的瓦文萨甚至要求他归还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和诺贝尔文学奖,直到后来才转变态度;而另一些人则表现出宽容和理解,比如作家瓦尔泽(M. Walser)和穆施格(A. Muschg)。教育学家亨蒂希(H. Hentig)力挺格拉斯^②,普通读者中也有人认为:十七岁学生被征入党卫军算不上罪孽,不能“用自以为是的后世人的尺子”去衡量“当年人们无法摆脱的命运”^③。在我国,译本问世前就争论不休,近年来围绕着“忏悔意识”、“记忆文学”的是是非非,也让人想起同样善于与媒体周旋的格拉斯。总之,德国文学现象俨然成了全球政治事件。沸反盈天,过问《剥洋葱》艺术价值的书评几为异数^④。

这件公案或许不妨搁置,但读者心头还是疑云萦绕:书中描述均系真实,还是如主人公的妹妹所言,又是拿来哄人的谎话(420)?在此恐怕不能忽视格拉斯笔下记忆和回忆之间的对立。这种区分当然并非首创,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回忆和记忆就不是一回事。黑格尔认为记忆是“死的”、外在的机制、载体和媒介,回忆则是“活的”、内在的心理过程^⑤。后来也有学者认为普遍的、公众的、学校性质的“记忆”有别于具备主观和私人特征的“回忆”^⑥。在格拉斯笔下,有趣的是与此相关的隐喻:“琥珀”和“洋葱”。

封面、封底上以及每章开头处都画着红色洋葱,千姿百态地象征着格拉斯对自己生活的层层剖析,只不过这重构的以往与真正的经历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关系。无数的问句、问号以及不定措辞都在

① 《德国就是格拉斯》,载《日耳曼学专业通讯》2006年第10期,第4页。

② 《哈特穆特·封·亨蒂希访谈录》,载2007年8月20日《明镜》周刊,第161页。

③ 关于《明镜》周刊文《时代史:莱比锡书展上的德国记忆文化》的读者来信,载2007年4月7日《明镜》周刊,第12页。

④ 霍斯特·维利·肖尔斯《反观自身的君特·格拉斯》,载《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文学快讯》,2006年,第9页。

⑤ 参见西比勒·克雷默《切勿遗忘了“遗忘”,或者遗忘乃是一种有缺陷的回忆方式?》,载《历史人类学国际期刊》(Paragrana)第9卷,2000年第2期,第265页。

⑥ 哈拉德·魏因里希《忘川:遗忘的艺术和批判》,贝克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暗示,在回忆这种复杂活动中主客观成分兼而有之,“剥洋葱”并不让人舒坦,与其说它是简单的再现,毋宁说它是往事的构建。“回忆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伪装”^①,如同一位“最不可靠的证人,她喜怒无常,经常偏头痛发作,此外还有一个随行就市、待价而沽的名声”,(64)让人想起哈佛学者夏克特(D. Schacter)列举的“七宗罪”^②。与洋葱不同,琥珀却能使人洞察一切。既然“假想的洋葱拒绝吐露真情,用难以解码的线条把信息刻在潮湿的洋葱皮上”(65),“我”就会转而求助于带有各色包体的琥珀。洋葱即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而琥珀即记忆则“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8),较起真来酷似一位“不受贿赂的会计”^③,忠诚地守护着一成不变、纹丝不动的真相。

洋葱和琥珀早在《铁皮鼓》、《蜗牛日记》等作品中就已露过面,两个意象不可或缺甚至相互依存。一方面,回忆“尽管看起来不清晰、有缺陷,还是比训练精确性的记忆意味着更多”,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琥珀”和其他无声地散落在四周的小物件,以便去回忆和被回忆(10-11)。

格拉斯将作家归于“职业回忆者”,对他们而言,回忆是“富矿坑、垃圾堆、档案库”,或者是体现了这部作品总体构思的洋葱:回忆如同一层又一层地剥洋葱,“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在我童年结束前后发生的一切,都在用事实叩门,这过程比你希望的更糟糕,它时而要你这样讲,时而要你那样说,最后使你误入歧途,谎话连篇。”(10)即是说,这本书仍然属于“诗”的范畴,是所谓“真实成分各各不一的故事”(437)?如果说,剥开生活这只洋葱的过程是“诗”,那么“真”又在何方?

① 格拉斯《我回忆》,载格拉斯《当我搜集蘑菇和羽毛》,施泰德尔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② 丹尼尔·夏克特《记忆的七宗罪》,李安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 格拉斯《我回忆》,载格拉斯《当我搜集蘑菇和羽毛》,施泰德尔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二

《剥洋葱》中虚实并举乃是故意为之：“这样一来故事可以保鲜，因为不完整，所以它们的内容必须杜撰得更丰富，它们永远不会讲完，总是等待时机续编或倒叙。”（223）显然，这位善用省略句的“胡诌大师”认为，不妨“凑出些什么名堂来”（239）以填补遗忘的空白，“在诗与真之间的羊肠小道上前行”（285）。

严格说来，自传体作品难免是“诗与真”。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八章米兰花园皈依场景就不无虚构色彩。马尔滕斯认为莫里茨的《安东·赖泽尔》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的重要性只有卢梭的自传能够媲美，但它却既是自传又是小说^①。卢梭的《忏悔录》常被倡导“说真话”者援引，虽被视为无情自我剖析之典范，但其真实性也受到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与其说他在自我忏悔，毋宁说他在控诉社会，是追踪妄想导致这位“日内瓦公民”在回忆和描述时陷入了失真^②。“失真”在歌德《诗与真》中同样存在，因为“真实的生活经常如此失去光泽，以至于人们有时不得不用虚构的清漆将它整修一新”^③。该书前言中就提到对素材的“半是诗意的、半是历史的处理”^④。对歌德而言，关键是对经历的真实进行赋予意义的阐释，进行文学虚构的重塑，因为“我们生活的事实之所以重要，并非在于它是真实的，而是在于它意味着什么”^⑤。

张隆溪在《记忆、历史、文学》一文中突出一个“真”字^⑥，然而对格拉斯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比唯一有效的“真”更可怕的了。他拒绝

① 瓦尔特·延斯主编《金德勒新文学辞典》，第11卷，金德勒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页。

② 参见同上，第14卷，第383页。

③ 歌德《诗与真》，载《歌德作品十二卷》，第8卷，柏林和魏玛建设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④ 同上，第12页。

⑤ 转引自延斯主编《金德勒新文学辞典》，第6卷，第444页。

⑥ 参见《外国文学》2008/1，第65—69页。

非黑即白而钟爱灰色,怀疑线性跃进而自诩蜗牛。从格拉斯的这一贯立场来看,《剥洋葱》亦虚亦实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真实的经历位于“虚构世界的灌木丛”(39)。而与这种扑朔迷离不无关系的是时空交错和自我裂变。

格氏作品常在时间长河中反潮流。《相聚在特尔格特》谜一般的首句就是适例:“明天曾发生的事情,昨天将会发生。”^①《我的世纪》的开头也让译者伤透脑筋:“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现。”^②这次也不例外:“洋葱对顺序并不太在乎。”(422)格拉斯引用自己数十年前的类似名言如“以后发生的,总是以前有过的”(165),不单意在建立某种互文性,也是为了在不同时间层面上展现从《头脑的产物》起就明确化了的“今昔未”概念,而且是通过分裂的我或曰双重的我的“蟹行”来展现:“我们所说的‘当今’,稍纵即逝的‘现在——现在——现在’,总是被过去的‘现在’笼罩着。所以,甚至向前逃跑的道路,即所谓‘未来’,也只能穿着铅一般沉重的鞋子走。”(165)于是隔着60年的时间跨度,“我”如此沉重地目睹当年的“我”跌跌撞撞地度过二战的最后岁月。在作家“我”剥洋葱的过程中,一个回忆着、叙述着的老年之“我”和一个被回忆、被叙述的少时之“我”常常面对面地登场,处于一种特殊的张力关系之中。

“我看见我”,这种现象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容易让人想起米德(G. H. Mead)笔下“主我”(I)和“客我”(me)的交往^③。在米德的理论中,“客我”中选存了以往的经验记忆,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可被观察的客体部分,而“主我”是担任观察者角色的主体部分。若移用在《剥洋葱》上,那么现在的回忆者“我”是I,而回忆的对象的“我”则是me? 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以前的“我”并非俯首帖耳,召之即来。对回忆者“帮我剥洋葱”的请求,被回忆者时常拒绝,“不想挺身而出充当以前的我”,认为回忆者根本无权“居高临下地

① 格拉斯《相聚在特尔格特》,卢赫特尔汉特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② 蔡鸿君《我的世纪》译后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③ 参见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158页。

把他弄趴下”(37)。“客我”一旦进入虚实并举的叙事世界就颇具主体性,不再任由“主我”摆布,这在格氏作品中不乏其例。

格拉斯多用旧作如《母鼠》中常见的电影叙事手法描述这种并不始终顺当的互动:图像时常中断,而且无论如何修补、拼接、重放,眼前依然杂乱无章。于是声称拒绝“忘川”的格拉斯被人指责患有选择性失忆症:英国的一篇书评认为“格拉斯从一开始就遮遮掩掩,‘党卫队’一词出现时,竟然不是主格,而是属格:‘一处党卫队的操场’,而‘我’出现的时候,也不是‘我’,而是‘那个挂着我名字的新兵’,这种习惯性的可怕的拐弯抹角贯穿了全书。……格拉斯的所谓忏悔令人失望,这不是在‘剥洋葱’,而是‘刷油漆’”^①。这种说法至少没有充分认识到格氏作品中与“我”有关的叙述方式的复杂性^②。

格拉斯一直对自传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游离于社会历史关联之外的“纯粹之我”不应该当轴处中,只有“时代之我”才值得成为无尽回忆的动因和文学虚构的对象。重要的不是作为“特殊个体”的“我”,而是作为时代典型、具有普遍意义的“我”,前者离开了后者便无足轻重。当年的“我”作为那一时代青少年群体的缩影,对纳粹并无足够的抵抗力,格拉斯曾称自己要是早出生几年,难保不会卷入犯罪过程^③。实际上他还是卷入了其中,如今作为《剥洋葱》的作者,他通过这种双重自我之间的张力,对“不会失去时效”(221)的过去进行了批判的反思:“反观历史,历史之镜中的我就是如此。这是抹不去、擦不掉的,并非写在一块小孩学写字的石板上,而且旁边也没搁着用来擦字的海绵”,而且“不能以‘是别人将我们引入歧途’为借口,为那男孩,也就是为我开脱”(44)。尤其使“我”羞愧的,并非在意识形态方面受了迷惑,并非曾是党卫军成员的经历,而是当年缺乏

① 康慨《君特·格拉斯自传〈剥洋葱〉是在“刷油漆”》,引自 blog.sina.com.cn/s/blog_4b9b3d59010009ve.html。

② 对此亦可参见埃德加·普拉滕《“我,替换了我的,每一年都要出现”——自传的功能及其在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纪〉中的超越》,载乌尔里希·布罗伊尔等编《同一性和功能性的局限》,伊乌迪西乌姆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305页。

③ 参见海因里希·福恩韦格《君特·格拉斯》,罗沃尔特袖珍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2及137页。

勇气和怀疑精神：在别人遭到凌辱和杀戮时，自己没有问个为什么，没有像书中“滑稽的海尼”那样特立独行地说出掷地有声的五个字：这事咱不干。至于为何迟至今日才公开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格拉斯的回答是由于日益增长的羞愧（127），或者推说一直在找合适的形式^①。其实，换种方式来辩护是否更具说服力：格拉斯一辈子都以“公民兼作家”的身份，从《铁皮鼓》开始即不懈地以实际行动、而不是以忏悔辞句弥补少不更事时的过失，克服不断啮咬灵魂的羞耻感？

三

在某种意义上，“强迫性回忆症”恐怕是比“选择性失忆症”更恰当的措辞，因为前者关系到“时代之我”背后的意义，后者却只涉及“纯粹之我”。2000年在立陶宛诺贝尔奖得主聚会上，格拉斯提到了“集体记忆”，提到德国人“发明出这么一个典型的、突出陈规俗套的词儿来：‘回忆工作’。人们要求‘回忆工作’，认为这是认罪表现；回忆工作成了苛求，人们难以做到或者拼命努力；因为几十年来，只要昔日不断地追上我们，回忆工作就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从60年代开始甚至对青年人也是如此，本来大家还认为他们是没有负担的一代人呢。看起来，连儿女乃至孙辈都要代替他们那些一声不吭的父亲和祖父回忆了。”^②我们的回忆是痛苦的，“但这却是看不到头的事。当我们规划未来时，昔日就已经在所谓的处女地上留下了气味的标记，支起了指路的牌子，要我们倒退到已经寿终正寝的时代去。”^③

“回忆工作”有个更出名的近义词“反思往昔”。对那黑暗十二年的梦魇经历，德国人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这点上，可以说格拉斯功莫大焉。记忆并不等于消极的储存，回忆更是主动的寻求，创造性的认识，带情感的活动。在“影片中断”、记忆空白时，叙述者首先乞灵

^① 北德广播电台《斯蒂芬·洛尔访谈录》，www.ndrkultur.de/ndrkultur_pages_std/0,2513,OID2976890_REF166_00.html。

^② 格拉斯《我回忆》，载格拉斯《当我搜集蘑菇和羽毛》，施泰德尔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③ 同上，第153页。